

《国际中文教育前沿》第1辑
江苏求真译林出版社 2022.12, 第26-40页

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对不同水平汉语二语者 复合词词义猜测的影响

王意颖 宋贝贝 洪 炜

摘要：本文通过实验考察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两个因素对汉语二语者复合词词义猜测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两个因素均显著影响汉语二语者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成绩，但二者的影响作用受学习者汉语二语水平的影响。初级阶段的学习者受词语结构的影响很小，但受语素义常用度影响显著；而到了中、高级阶段，词语结构的影响逐渐显著，而语素义常用度的影响有所降低。这说明汉语二语者语素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早于词语结构意识，这与词语结构意识的形成需要以一定的语言知识为基础有关。此外，研究结果也显示，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学习者对复合词语素义表征从初级阶段的“核心语素义表征”逐渐过渡到中、高级阶段的“独立语素义表征”。

关键词：词语结构；语素义常用度；汉语水平；复合词；词义猜测

作者简介：王意颖，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二语词汇习得、国际中文教育，邮箱：610680912@qq.com；宋贝贝，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词汇语义学、汉语二语词汇习得；洪炜，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二语习得与加工、国际中文教育。
基金项目：暨南大学广东语言文化海外传承研究基地 2022 年度自设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2JNZS78）。

1. 引言

在语言习得中,词汇的习得是重要的一部分。在汉语词汇系统中,汉语中绝大多数词是由语素合成的复合词,语素之间按照不同的语法关系构成了多种结构的复合词。复合词在汉语作为二语的词汇习得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影响复合词习得的诸多因素中,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是两个较为重要的因素(干红梅 2009; 许艳华 2014; 王意颖等 2017)。

首先,词语结构影响复合词词义猜测、词汇习得及认知加工。词语结构指参照句法结构关系归纳出的复合词内部结构类型,体现出语素和语素的组合关系,主要包括偏正、联合、主谓、动宾和动补等。相关研究证实,词语结构影响复合词的词义猜测、习得和加工效果。对于母语者而言,已有研究表明,偏正结构利于语义启动,联合结构复合词抑制语义启动,三年级的汉语母语儿童具有词语结构意识(Liu & McBride-Chang 2010, 2013)。在神经语言学方面,Hsu (2018)使用 MEG 的方法证明母语者在加工不同结构的汉语双音节词时,大脑的激活的皮层有所区别。这些研究都表明,不同结构的汉语复合词的加工有所不同。

对汉语二语者的研究中,冯丽萍(2003)发现,中级水平欧美学习者具有词语结构意识。郭胜春(2004)、江新、房艳霞(2012)证实,偏正式复合词的猜词效果好于动宾式。干红梅(2009)发现,偏正结构复合词习得效果显著好于联合结构。许艳华(2014)通过测试和问卷调查发现,五种词语结构复合词的易猜顺序为: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并列结构>动补结构。王意颖等(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结构复合词习得效果的排序依次为:偏正结构>联合结构>动补/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在自主释义和选择题中表现有差异。

其次,语素义常用度(语素义项频率)也对复合词词义猜测、词汇习得及认知加工产生影响。语素义常用度是指语素义的使用频度。语素在未参与构词时可以有多个意义,参与构词后就只有一个确定的意义。语素义根据使用频率可分为常用义和非(不)常用义。常用义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在词典释义中一般是排序在前的一两个义项,如“道”的“道路”义。非常用义使用频率较低,在词典中一般排序靠后,如“黑”的“坏;狠毒”义。构词语素义的常用度可影响复合词的词义猜测和习得。赵玮(2016)指出,准中级水平学生具备一定的语素识别能力,能判断一些常用语素的意义,但是难以区别常用度较低的语素。王意颖等(2017)通过纸笔测试的实验证实,对于中级水平学习者,两个语素都为常用义

的复合词习得效果，好于其中一个语素为非常用义的复合词，两个语素都为非常用义的复合词习得效果最差。李琪（2019）的实验也发现，频率高低对留学生猜测复合词词义有影响，高频义项构成的复合词比低频义项构成的猜测效果好。

多义语素和多义词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分别表示一个语素和一个词的多个意义，多义语素的表征和加工可能与多义词的表征和加工模式类似。多义词的表征和加工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表征模式，即核心词义表征和独立词义表征。“核心表征”认为人们的心理词典中储存的只有一个基本词义，其他的词义是需要在线扩展才能得到（Caramazza & Grober 1976; Nunberg 1979, 1995; Frisson & Pickering 1999; Pickering & Frisson 2001）；“独立表征”认为人们头脑中对每个词义是单独储存的，每个相应的词义在具体的上下文中能直接激活（Klein & Murphy 2001; Foraker & Murphy 2012），而具体采用哪种表征模式可能受义项之间的相关程度、语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已关注到词语结构或语素义常用度因素对复合词习得的影响，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以往研究大多考察的是词语结构（冯丽萍 2003; 干红梅 2009）或语素义常用度因素（王意颖等 2017）对某一特定语言水平（主要为中级水平）学习者的影响，缺乏对不同水平学习者的考察，不利于深入探讨复合词词义猜测的发展变化。其次，大多研究仅单独关注词语结构或语素义常用度的影响，对于词语结构、语素义常用度和语言水平的交互影响未进行深入地探讨。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的影响是否会随汉语水平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体有何变化，值得探讨。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研究采取自主释义的测试方法，系统考察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因素对初级、中级和高级水平汉语二语者复合词词义猜测的具体影响，从而加深对复合词词义猜测的认识，为汉语作为二语的词汇习得与教学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对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在留学生汉语复合词词语猜测中的作用进行系统考察，具体探讨以下问题：

- （1）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两个因素对词义猜测的影响如何？

(2) 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的影响是否随汉语水平不同而发生变化?

2.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 2 (词语结构: 偏正 vs. 联合) × 2 (语素义常用度: 常常 vs. 常非/非常^①) × 3 (汉语水平: 初、中、高) 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其中, 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是被试内因素, 汉语水平是被试间因素。

2.3 被试

81 名 (男 39, 女 42) 汉语二语者参加了本次实验。其中, 初级水平 19 人, 汉语学习时间为 8 个月左右, 汉语水平大致为新 HSK2 级。中级水平 33 人, 汉语学习时间为 1~2 年, 汉语水平大致为新 HSK3 级或 4 级。高级水平 29 人, 汉语学习时间为 3 年或以上, 汉语水平大致为新 HSK5 级或 6 级。在每个水平被试中, 有汉字背景的被试 (日本、韩国和越南学生) 和无汉字背景的被试 (巴拿马、乌克兰、美国等欧美学生) 人数相当。被试年龄为 18 至 29 岁。

2.4 实验材料

本研究的实验目标词均为高级词或超纲词, 以确保初级、中级和高级学习者未学过。实验用词选取的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 选取一定数量的备选目标词。备选目标词中的高级词来源于《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2010) (以下简称《等级划分》) 中的三级词 (即高级词), 超纲词则从“全球汉语教材库” (<http://ctmlib.com>) 的 325 册汉语教材中选取。

其次, 从上述备选目标词中进一步筛选出语素为一级字 (即高频汉字) 的高级词和超纲词, 并请 2 名任课教师和初级、中级、高级水平各 3 名学生选出那些构词语素熟悉、已基本掌握但未学过的词。

再次, 筛选出语义透明词^②。语义透明词是可直接通过语素义推知词义的词, 如“车轮”, 语义不透明词是无法通过语素义推知词义的词, 如水果“龙眼”。

① “常常”“常非/非常”是语素义常用度类型, 详见“实验材料”部分。

② 相关研究证明, 语义透明度影响词汇学习效果 (千红梅 2008)。为了控制变量, 本文只选择语义透明词作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请 10 名母语者对所选词语进行透明度评定，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非常透明”为 5 分，“完全不透明”为 1 分，最终筛选出透明度平均分高于 4 分的词语。

最后，根据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类型筛选出实验用词。词语结构类型选择偏正、联合两种，原因在于这两种类型的复合词在现代汉语中数量较多（葛本仪、杨端志 2003）。语素义根据使用频率可分为常用义和非常用义。判断标准包括：（1）构词能力强弱。“越是常用的意义构词能力越强，构词越多”（葛本仪、杨端志 2003），如“声”的语素义“声音”可以构成“歌声”“鼾声”“吼声”“呼声”“回声”“连声”“轻声”“失声”“鸦雀无声”“声波”“声控”“声调”等词，构词能力较强，语素义为常用义。“声”的另一个语素义“名声”只能构成“声望”“声誉”“名声”等词，构词能力较弱，语素义为非常用义。（2）在词典释义中位置的前后。常用义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在词典释义中一般是排序在前的一两个义项，如“道”的“道路”义。非常用义使用频率较低，在词典中一般排序靠后，如“黑”的“坏；狠毒”义。本研究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的释义，该词典在义项排列方面突出了现代性、常用性，把现代常用义放在首位，把现代很少使用的意义放在后面（江蓝生 2013）。因此，我们把排在前面的一两个义项看作常用义，把排在后面的义项看作非常用义。

本研究根据语素义常用度将复合词概括为两种主要类型：“常用义—常用义”“常用义—非常用义/非常用义-常用义”（以下简称“常常”“常非/非常”）^③。最终，根据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我们分为“偏正—常常”（如“动向”）、“联合—常常”（如“歌舞”）、“偏正—常非/非常”（如“黑话”）、“联合—常非/非常”（如“字画”）四种类型，每种类型选取了 8 个词，共 32 个实验用词。

2.5 实验程序

实验材料以解释题的方式编制，四类实验词语出现顺序随机。实验前我们对 5 名学习者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预测试和访谈，确保实验词语符合实验设计。实验结束后，通过对试题信度和每题与该类题总相关度的统计，结果显示题目信度

^③ 王意颖等（2017）根据语素义常用度将复合词分为“常常”“常非/非常”“非非”三类，我们筛选实验用词时发现，属于“非非”类的复合词数量很少，因此重点考察“常常”“常非/非常”两类。

为 0.797，信度较高，每题与该类题总相关度均高于 0.30，相关度较高。

本实验采用纸笔测试，采取课堂测试的方式进行。在实验指导语中，要求被试解释词语意思，实验所用时间为 30 分钟，被试可以使用汉语、英语或者自己的母语来解释实验词语。

2.6 评分标准

本实验采取五级评分制，每词根据被试作答情况评定为 0、0.5、1、1.5、2 分。具体评定标准如下：2 分——结构和两个语素义都解释正确，如“车轮——车的轮子”。1.5 分——结构正确，一个语素义解释正确，如“黑话——不好的话”。1 分——结构错，两个语素义解释正确，如“风沙——风中有沙”；结构对，两个语素义解释错误，如“手心——很重要的事情”。0.5 分——只有一个语素义的解释正确，结构错误，另一个语素义解释错误，如“亲友——亲密的朋友”。0 分——未做出回答；结构和两个语素义都解释错误，如“子息——休息”。每类词语满分均为 16 分。

3. 实验结果

我们分别对初级、中级和高级水平汉语学习者四种类型词语的测试成绩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括号内为标准差（SD）。

表 1 四种类型复合词的平均分及标准差

	偏正—常常	联合—常常	偏正—常非 / 非常	联合—常非 / 非常
初级(N=19)	7.63 (3.74)	6.60 (4.46)	3.87 (3.09)	2.61 (3.25)
中级(N=33)	10.82 (2.91)	6.93 (2.64)	8.20 (3.01)	4.85 (3.07)
高级(N=29)	12.59 (2.37)	8.31 (2.53)	10.40 (2.59)	5.53 (2.77)

用 SPSS19.0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ed measures ANOVA）检验，结果显示：词语结构的主效应显著。 $F(1, 78) = 108.908, p < 0.001$ ，说明两种结构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成绩有显著差异。偏正结构复合词的成绩显著好于联合结构。

语素义常用度的主效应显著。 $F(1, 78) = 141.240, p < 0.001$ ，说明两种语素义常用度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成绩有显著差异。“常常”类复合词的成绩显著好于“常非 / 非常”类。

汉语水平的主效应也显著。 $F(2, 78) = 829.118, p < 0.001$ ，说明汉语水平对

复合词的习得有显著影响。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高级水平学习者的复合词词义猜测成绩显著高于中级水平学习者，中级水平学习者的复合词词义猜测成绩显著高于初级水平学习者（ $p<0.001$ ）。

词语结构和汉语水平的交互效应显著， $F(2, 78)=10.122$ ， $p<0.001$ 。进一步的简单主效应分析表明，当汉语水平是初级时，偏正结构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成绩略好于联合结构，但差异不显著， $p=0.145$ ；当汉语水平是中级和高级时，偏正结构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成绩均显著好于联合结构， $ps<0.001$ 。从图1可知，汉语水平越高，偏正结构的词义猜测效果越好于联合结构，即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词语结构对汉语二语者汉语复合词词义猜测的影响也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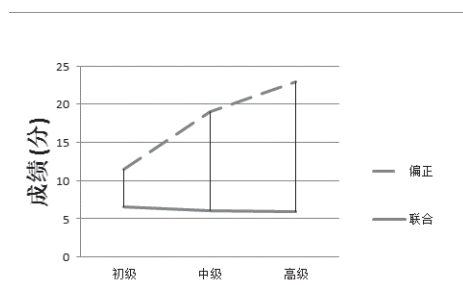


图1 词语结构对不同水平学习者词义猜词成绩的影响

语素义常用度和汉语水平的交互效应也显著， $F(2, 78)=3.436$ ， $p<0.05$ 。简单主效应分析表明，当汉语水平为初级、中级、高级时，“常常”类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成绩均显著好于“常非/非常”类， $ps<0.001$ 。但从图2可以看出，在初级水平阶段，语素义常用度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中、高级水平阶段，即汉语水平越低，语素义常用度对汉语二语者复合词词义理解所产生的影响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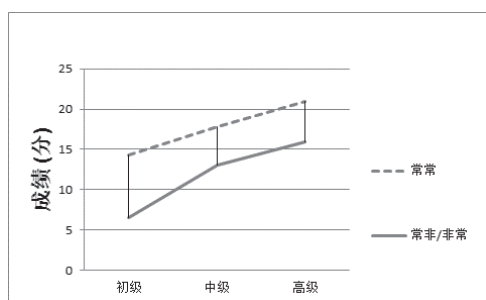


图2 语素义常用度对不同水平学习者词义猜词成绩的影响

此外，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F(1, 2)=0.041$ ，

$p=0.84$; 词语结构、语素义常用度、汉语水平之间的三项交互效应不显著, $F(2, 78) = 0.568$, $p=0.569$ 。

4. 讨论

4.1 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在复合词习得中的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偏正结构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效果显著好于联合结构; “常常”类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效果也显著好于“常非/非常”类复合词。这说明词语结构、语素义常用度均能对复合词的词义猜测产生显著影响。

4.1.1 词语结构的作用

由于本研究中目标词均为学习者不熟悉的语义透明词, 因此学习者会通过语素分解的方式来合成词义, 即先分解词语中的语素, 再识别语素义, 从而通达整词意义 (Taft & Forster 1975; Gagné & Spalding 2004), 而在此过程中, 语素之间的关系需要被激活。王意颖等 (2018) 指出, 外国留学生对不同结构的词语进行词义猜测, 即进行概念合成的过程中, 受到词语结构经验图式的影响。词语结构信息构成经验图式, 人们会预期在词汇中抽象出词语结构信息, 使某些结构能成为默认值。学习者接触汉语词语的时候, 在头脑中把词语的结构信息存储起来, 形成经验图式, 这可能是一个隐性的学习过程。

本研究结果表明偏正结构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效果要好于联合结构词语。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 现代汉语复合词中, 偏正结构词语的比例 (53%) 远多于联合结构 (27.8%) (张登歧 1997)。受接触频率影响, 汉语二语学习者遇到新词时, 激活接触更多的偏正结构的可能性更高。因此不少联合结构的词语, 学习者会解释为偏正结构, 例如“亲友”, 73.5% 的中、高级学习者解释为“亲爱的朋友”“亲密的朋友”等联合结构, “子息”解释为“儿子的消息”。其次, 与两类结构词语中语素义与整词的语义的关系也有关系。陈琳等 (2017) 认为, 偏正结构和联合结构两类合成词中, 词与语素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同, 偏正结构的两个语素对整词语义的贡献清晰明确, 联合结构的整词与语素之间的关系更容易产生干扰和竞争关系。在偏正结构的词语中, 两个语素之间是修饰关系, 语素地位不同, 两个语素有着独立的语义贡献。中、高级学习者的词语结构意识正在发展中, 对于他们而言, 在对新词进行概念合成过程中, 清晰的语义贡献有助于通达整词意义。而联合结构的词语中, 两个语素常常有着相关或者

相近的意思，例如“草木”“刀枪”等，学习者在进行概念整合的加工过程中，会相互激活，互相干扰和竞争，反而可能影响整词意义的完整获得。例如“草木”一词，学习者会释义为“草”。这是由于两个语素意义之间具有相关性而使得学习者反而忽略了两个语素之间的差异，影响整词意义的加工。

4.1.2 语素义常用度的作用

本实验还发现，对于不同结构的复合词，都是两个语素的意义均为常用义的“常常”类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成绩显著好于其中一个语素是常用义另一个语素是非常用义的“常非/非常”类复合词，且这一现象贯穿初级、中级、高级整个学习过程。换言之，语素义越常用，越有助于复合词的词义猜测。

上述我们谈到汉语二语学习者对不熟悉的语义透明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是一个概念合成的过程，学习者先分解语素，再通过识别和加工语素义来整合成新的意义。由于二语学习者头脑中常常是只储存了语素的一个意义，即常用义；而不常用语素义可能在大脑中尚不存在表征，难以识别和加工，因此“常常”类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显著好于“常非/非常”类复合词。

例如，对于“常常”类复合词“实话”，平均得分为 1.3，其中初级水平学习者得分为 0.82，中级水平得者分为 1.25，高级水平得者分为 1.6。对“常非/非常”类复合词“黑话”，平均得分为 1.06，其中初级水平学习者得分为 0.71，中级水平者得分为 1.18，高级水平者得分为 1.11。可见，对“实话”的释义在总体和各个水平的得分都要比“黑话”高。在这两个词语中，“话”都是常用语素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意思为“说出来的能够表达思想的声音，或者把这种声音记录下来的文字”。“实”的意思是“真实；实在（跟“虚”相对）”，是常用语素义。“黑”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义项为“①像煤或墨的颜色（跟“白”相对）；②黑暗；③夜晚；黑夜；④秘密；非法的；不公开的；⑤坏；狠毒；⑥姓”。“黑话”的“黑”是“④秘密；非法的；不公开的”意思，是非常用语素义。留学生对这两个词语进行加工时，常用语素义“话”和“实”容易识别和加工，“黑”中的“秘密；非法的，不公开的”义难以被识别和加工。因此大部分学习者对“黑话”的释义为“黑色的话”“说别人不好的话”“脏话”“不好听的话”“会伤害别人的话”等。总而言之，对于汉语二语学习者，常用语素义相比非常用语素义更容易得到识别和激活，因此“常常”类复合词的词义猜测得分要显著好于“常非/非常”类复合词。

4.2 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影响的动态发展过程

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汉语二语水平的提高,词语结构和语素义常用度对留学生汉语复合词词义猜测的影响会发生变化。

4.2.1 词语结构影响的动态发展情况

不同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在通过语素义通达整词意义过程中,词语结构并非一直起显著作用。对于初级水平学习者,其词义猜测受词语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于中级、高级水平学习者,词语结构对词义猜测有显著影响,偏正结构的猜测效果要好于联合结构。换言之,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词语结构对词义猜测的影响也逐渐加大。

初级水平学习者词义猜测受词语结构的影响不显著与其尚没有形成词语结构的经验图式有关。初级水平学习者学习汉语时间不长,词汇量有限,直接影响了其对词语结构经验图式的存储程度。即初级学习者遇到一个新词时,头脑中没有足够的语言经验形成的词语结构图式,词语结构意识尚未发展起来。例如,对于偏正式“动向”,初级学习者解释为“运动”,将联合式“亲友”解释为“亲爱的朋友”,“心声”解释为“心”,可见学习者尚处在只是解释语素意义的阶段,尚未有区分词语结构的意识。这与徐彩华等(2000)、Liu & McBride-Chang (2013)研究中的母语者不一样,小学生虽说是处于词语学习初期,但是作为母语者,他们头脑中早已存储了一定量的汉语词汇,并形成了词语结构的经验图式。到了中、高级阶段,随着学习者词汇量的增加,学习者在语言体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词语结构的经验图式。受不同词语结构词汇接触频率差异影响,接触频率更高的偏正结构词语经验图式在加工中会形成优势。因此,到了中、高级水平阶段,词语结构对二语学习者词义猜测的影响与其对母语者的影响一致,均是偏正结构词语猜测效果好于联合结构词语。

汉语二语学习者词语结构意识呈现出的动态发展特点也可从心理词典的组织 and 表征的角度解释。Liu & McBride-Chang (2013)提出学习新词重要的目标是通过合适的组织(proper organization)把新词储存在心理词典中,基于词语结构信息的心理词典组织有助于学习者在已储存的词语中建立除了语义连接之外的额外的连接节点,从而方便编码和检索词语。如图3(Liu & McBride-Chang 2013)所示,学习者猜测生词词义时,通过次词汇路径(即上文所说的“语素分

解模型”）通达词义，词语结构信息是词汇加工中的重要部分，可以为语素间建立联系提供连接节点。因此他们认为当学习者具备更好的依赖结构意识的心理词典组织能力时，便能更好地学习和记忆新的单词。同理，对于中、高级水平的汉语二语者而言，词语结构意识的快速发展，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发现语素之间的语法结构特点，在心理词典组织中建立连接节点，从而有利于词语的词义猜测，让二语学习者更容易地习得和记忆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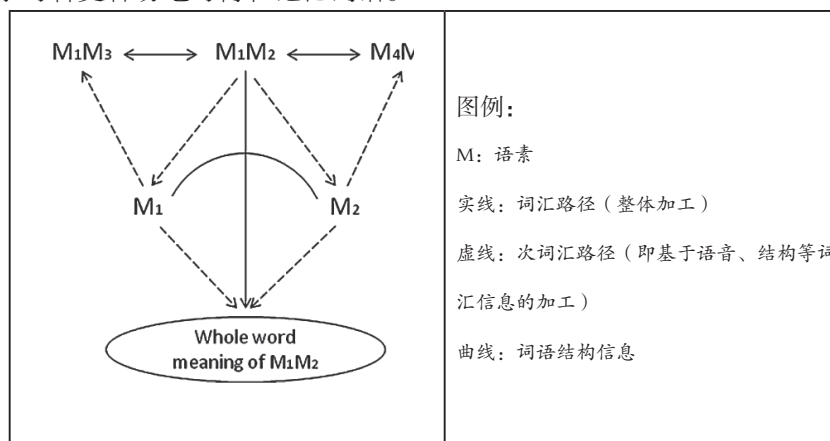


图3 词语结构信息加工、词组织和词义通达的关系

我们认为二语学习者词语结构意识的形成是一种内隐的学习过程，是一种无意识但确实存在的信息学习过程。Chen (2018) 通过实验指出，熟练的汉语二语者可以利用对生词内部结构的敏感性来推测词义，在有无语境信息的情况下都可利用形态意识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和词汇知识来推断词义。但是语言不熟练的二语者的形态意识在词义猜测中不起作用，形态意识的形成有语言知识的门槛，需要以一定的语言知识为基础 (Koda & Miller 2018; Chen 2018)。本研究所探讨的词语结构意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显性形态意识，但可以看作一种隐性形态意识 (Liu & McBride-Chang 2013)，该意识的形成及其在词义推测中的作用与显性形态意识有一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认为要形成词语结构意识，要基于一定的词汇量，对词语的熟悉度达到一定程度，以一定汉语水平为基础。本研究的实验为此提供了证据，在初级水平阶段，学习者没有一定的汉语词汇基础，遇到新词语时处于分解语义的阶段，难以识别语素间的语法结构，到了中、高级水平阶段，学习者词汇量逐渐丰富，具有了识别词语结构的意识。

4.2.2 语素义常用度的影响和动态发展情况

初级水平的留学生已经具备了语素义意识，能够利用语素义来推测词义，尤其是常用的语素义，而且语素义常用度影响大。到了中、高级水平阶段，学习者具备了更好的语素义意识。我们认为，语素义意识在初级阶段就已经形成。语素义意识的形成更像是一个外显的学习过程，对语素的意义是可知的，是对外显信息的加工。从图2语素义常用度与汉语水平的交互关系来看，处于初级汉语水平时，“常常”类复合词的词义猜测效果要更好于“常非/非常”类的效果，即汉语水平越低，语素义因素对留学生汉语合成词理解所起的作用越大。处于中级和高级汉语水平阶段，二者的差异变小，语素义的因素的影响也变小。

曾有研究证明，英语二语多义词表征的发展趋势，认为是从学习初期的“核心表征”逐步走向“独立表征”的过程（赵翠莲 2005；王柳琪等 2012）。本研究发现，多义语素义的表征和加工与此类似，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记忆中只存储一个语素义，体现“核心表征”；高级水平学习者体现“独立表征”，存储不止一个核心语素义，各个语素义是单独储存的；中级水平学习者处于二者之间。初、中、高三个水平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连续体，每个学习者对复合词不同语素义表征都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来看一下被试的答题情况。对于“手心”一词，“手”是常用语素义，“心”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义项为“①人和高等动物身体内推动血液循环的器官，也叫心脏；②通常也指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等；③中心；中央的部分；④二十八宿之一；⑤姓”，“手心”中“心”为“③中心；中央的部分”这个意思。在实验中，不少初级水平被试只能对“手”这一常用语素义解释正确，31.6%的被试对“手”的释义正确，只有一个被试（5.7%）对“心”释义正确。留学生对“心”的释义有：小心、用心、心中、真心等，都是错误地释义为“心”的第一、第二个语素义。这与王柳琪等（2012）谈到的“低水平二语者常以典型义为首选词义表征于大脑中”一样，初级水平被试心理词典中只对核心语素义进行表征，体现了核心语素义表征观。中级水平的，36.4%的被试对“手”释义正确，21.2%的被试对“心：中心，中央的部分”这一非常用语素义释义正确。对“心”的非常用语素义的正确率大大提高了。高级水平被试中，51.7%对“手”的释义正确，34.5%对“心”释义正确。这说明了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留学生不仅储存有“心”的常用语素义，还逐渐独立储存它的非常用义，即非常用语素义有了独立表征，因此能激活非常用语素义用于加工。由于二语学习者对

语素义表征和激活加工是一个从“核心表征”逐渐转向各语素义“独立表征”的动态过程，因此语素义常用度对复合词词义猜测的影响也显示出了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

整体而言，本研究发​​现语素义常用度对汉语二语者词义猜测的影响作用要早于词语结构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语素义常用度效应在初级阶段就出现，词语结构意识在中级阶段才显现。这是由于语素义的学习是更外显的，学习者很早就开始利用，而词语结构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内隐的过程，需要有一定的语言知识作为基础。干红梅（2009）通过对中级水平学习者的调查访谈也发现，学习者通过分析构词语素的意思来分析词语结构。可见语素义的习得是词语结构习得的一个重要前提，二语学习者需要先掌握了语素义之后，才有可能逐步形成词语结构意识。

5. 结语

本文通过一项实证研究考察词语结构、语素义常用度对汉语二语学习者复合词习得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两个因素均显著影响汉语二语复合词的词义猜测，但二者的影响作用受学习者汉语二语水平的影响。初级阶段的学习者受词语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受语素义常用度影响显著；而到了中、高级阶段，词语结构的影响逐渐显著，而语素义常用度的影响有所降低。上述结果表明，语素义意识的形成出现较早；而词语结构意识的形成由于需要以一定的语言知识为基础，因此出现较晚。此外，研究结果也显示，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学习者对复合词语素义的表征从初级阶段的“核心表征”逐渐过渡到中、高级阶段的“独立表征”。

以上研究结果对二语复合词的学习与教学具有启发作用。首先，在学习者初级阶段时，教师应当加强对学习者语素意识的培养。教学中虽然应主要教授核心的语素义，但也要让学习者意识到语素的歧义性。到了中级、高级阶段，应引导学习者对常用语素义和非（不）常用语素义进行鉴别，提高其猜词过程中根据语境准确提取正确语素义的能力。其次，在初级阶段后期，当学习者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词汇后，应向学习者简单介绍汉语词汇结构知识，为培养结构意识奠定基础。进入中级水平阶段，教师应该重视对学习者词汇结构意识的培养，帮助学习者利用词语结构知识为习得词汇服务。

参考文献

- 陈琳、钟罗金、冷英. 2017. 非熟练的韩国汉语学习者合成词加工中词优效应的特点. 《心理学报》第 10 期: 1277-1286.
- 冯丽萍. 2003. 中级汉语水平留学生的词汇结构意识与阅读能力的培养. 《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66-72.
- 干红梅. 2008. 语义透明度对中级汉语阅读中词汇学习的影响. 《语言文字应用》第 1 期: 120-128.
- 干红梅. 2009. 词语识别结构及其对汉语阅读中词汇学习的影响. 《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 82-90.
- 葛本仪、杨端志. 2003. 《汉语词汇学第 3 册汉语的词义探析》.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郭胜春. 2003. 汉语语素义在留学生词义获得中的作用.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6 期: 27-36.
- 国家汉办、教育部社科司《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课题组. 2010. 《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李琪. 2019. 语素义项频率及构词力对复合词词义猜测的影响. 《海外华文教育》第 3 期: 41-52.
- 江蓝生. 2013. 《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 概述. 《辞书研究》第 2 期: 1-19.
- 王柳琪、傅蓓、康丽英、刘绍龙. 2012. 不同二语水平者的多义词表征通达机制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2 期: 45-49.
- 王意颖、宋贝贝、陈琳. 2017. 语素义常用度影响留学生语义透明词习得的实证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 134-143.
- 王意颖、宋贝贝、洪炜. 2018. 词语结构对中级水平留学生习得语义透明词的影响. 《汉语学习》第 1 期: 95-103.
- 徐彩华、李镗、张必隐. 2000. 心理语言学视野中的中文字词教学. 《宁波大学学报》第 1 期: 5-9.
- 许艳华. 2014. 复合词结构类型对词义猜测的影响.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17-23.
- 张登歧. 1997. 汉语合成动词的结构特点. 《中国语文》第 5 期: 336-338.
- 赵翠莲. 2005. 多义词心理表征的发展模式——基于对中国 EFL 学习者的实验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294-302.
- 赵玮. 2016.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教学“语素法”适用性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276-288.
- Caramazza, A. & E. G. 1976. Polysemy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ubjective lexicon. In C. Rameh (Ed.), *Seman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Chen, T. X. 2018. The contribution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to lexical inferencing in L2 Chinese: Comparing more-skilled and less-skilled learners.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1-15.

FORAKER. S. & G. L. M. 2012. Polysemy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effects of meaning dominance.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67: 407–425.

Frisson. S. & M. J. Pickering. 1999. The processing of metonymy: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5: 1366–1383.

Gagné. C. L. & T. L. Spalding. 2004. Effect of relation availability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ccess of familiar noun–noun compounds. *Brain and Language*, 90: 478–486.

Hsu. C. H, L. Pykkänen & C. Y. Lee 2018. Effects of morphological complexity in left temporal cortex: An MEG study of reading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 49: 168–177.

Klein. D. E. & G. Murphy. 2001. The representation of polysemous word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5: 259–282.

Koda. K. & R. Miller. 2018. Cross-linguistic interaction in L2 word meaning inference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H. Pae (Ed.), *Writing systems, reading processes, and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s: Reflections from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Liu. P. D. & C. McBride-Chang. 2010. Morphological processing of Chinese compounds from a grammatical view.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31: 605–617.

Liu. P. D. & C. McBride-Chang. 2013.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processing during word recogni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haracter reading among third-grade Chinese children.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43: 715–735.

Nunberg. G. 1979. The non-uniqueness of semantic solutions: polysemy.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 143–184.

Nunberg. G. 1995. Transfers of meaning. *Journal of Semantics*, 2: 109–132.

Pickering. M. J. & S. Frisson. 2001. Processing ambiguous verbs: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7: 556–573.

Taft. M. & K. Forster. 1975. Lexical storage and retrieval of prefixed words.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ur*, 6: 638–647.